

平淡细节里感受生活的波澜壮阔

——访《喜马拉雅天梯》导演萧寒

一座山、一群人的故事?是萧寒在影片拍摄中需要面对的难题。

萧寒说,如果是剧情片或一般的纪录片,他可能会突出极限登山的高难度和生死攸关。但是,严酷的自然环境里,人类会本能地挣扎求生。所以,影片反映人与自然的思考是应有之义。但一直以来存在的“喜马拉雅”被外界过度消费,甚至被人地符号化。如果不用平实的记录手法还原出来的话,人与环境的真相永远只是单一的理解。

宗教元素的暗含其中也注定了主题表达的多元性。上绒布寺僧人阿古桑杰说,对藏族人来说,珠峰是神圣的,相传莲花生大师曾在此修行,作为圣地,珠峰不该被打扰,但现在,攀登它却成了都市人热衷的时尚。萧寒说其实阿古桑杰还有一些更尖锐的话没有在影片中播出。他认为珠峰上的尸体,是山神的愤怒,是对攀登的抗议。但是,当登山者、高山向导来庙里祈福时,他又非常真诚地为他们祈祷保佑。

萧寒说,在藏传佛教当中,神山从来不是用来攀登的,而是膜拜和转山祈福。

面对这些现实,萧寒并没有把观点强加给任何人,而是记录和呈现。最终,他和团队选定了“弱故事、弱人物”的线条,初赴珠峰的登山向导索多,在登顶前的满满欲望,登顶后的倦怠;经验丰富的总指挥次仁桑珠,对一心圆梦的“客户”们一二次次的规劝;一僧一寺的阿古桑杰,面对圣山今昔的感伤与无奈……

这种创作风格,在影片放映后曾引起一片热议。团队延时摄影师王恒拍到的美轮美奂的冰塔林星夜银河,深蓝色神秘静谧的夜空闪烁着绸缎般的质感,点缀着碎钻般的星,只在片尾处用一秒几帧的速度快速闪过。

“我们想让大家都知道,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,把这种平实、真实的状态呈现出来。让大家在真实、平淡的细节里,去感受生活里的波澜壮阔,而不是画面制造的绚烂,哪怕这种绚烂也是真实的。”萧寒说。

执与惑:一场修行与磨练

登山是一场修行,是一场磨练。对于萧寒来说,拍摄《喜马拉雅天梯》也像是一场修行。

在此之前,这个选题已经被搁置了两年。雷建军不是没有跟其他人接触过,但是没有一家机构愿意出钱来拍摄。大家都很清楚,这是一件太费钱的事。

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自信。”萧寒打了200万的谱,即使全赔了,不影响生活就可以了。



2011年,雷建军与萧寒正式筹备拍摄。2012年,田野调查。2013年9月,正式开机。

没想到,还没拍到登山,200万元就花完了。为了拍摄,萧寒卖掉了一处房子,“500万,够不够?”然而,萧寒还是太天真了,500万,很快又没了。可是,哪怕在最难的时候,萧寒也没有想过中途停下来。就跟登珠峰一样,停下来,可能就意味着再也没有下一次机会。

好在,难度不断出现的同时,萧寒也看到了希望。就在钱花到最后一分的时刻,影片迎来了第一笔赞助,陆续又有新的投资。这让萧寒觉得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支持着他。萧寒说:“四年前,我以为是找到了它,这个世界上最高的女神;今天我才明白,是它给我机会去呈现一个本就在那里的事实。”

影片的选题和视角也吸引了优秀的团队。一开始,只有萧寒与雷建军两个人,后来导演梁君健加入。搭班子、建团队,他们吸引了最优秀的高山摄影师孔西旺加等人。每个人都以极大的热情与毅力投入其中,他们都在海拔5300米以上的珠峰大本营驻扎过两个月以上,有人甚至患上了中度肺水肿,高原反应的滋味,让大家记忆深刻。只爬过北京香山的摄影师,被逼成了登山运动员,扛着机器爬到了海拔7028米,体重从160斤减到了140斤。

激励萧寒和团队前行的,是他们都想借助电影进行探寻:面对宗教与世俗,传统与现实的冲击,以登山少年们为代表的当代藏族年轻人该如何自处?天梯通向哪里?为什么这么多人想登上珠峰?他们去山顶寻找什么?自然造就如此高的一座山,究竟又要启示什么?

4万5000多分钟的拍摄素材,1300万元的投入,整整4年的时间,当剪辑师终于停下手中的工作时,包括萧寒在内的所有人,心情是如此复杂。

梦与真:追寻纯粹与热爱

影片筹备四年,离西藏走得越来越近,藏人身上很多特质打动了萧寒,

也让他也在潜移默化间发生改变。

比如获得快乐的能力。如今,都市人获得快乐的能力越来越低,甚至连快乐时也不那么纯粹。而影片拍摄期间,萧寒看到,西藏人获得快乐的能力特别强大。影片的线索人物之一索多就给了萧寒很大启示。索多的快乐与烦恼,就是能否有机会登山,如果能登山,他就很快乐,很开心,而不像都市人,无论快乐烦恼与否,都仿佛缠着。

这让萧寒开始思考,自己有没有变得更纯粹。他希望自己的情感状态、生活状态也能变得纯粹自然,更加发自内心地选择自己热爱的东西。不要等到各种事情都准备好了,才真正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事,那样反而很可能做不成。

作为大学老师,萧寒身上有一种不同于一般知识分子内敛、含蓄之外的个性。

在拍摄纪录片之前,萧寒先后做过画家、主持人以及戏剧策展。一直在艺术创作道路上行走的他,几乎每一步都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成绩。出身艺术世家,5岁学画,顺理成章入读美院,研究生毕业后却出乎意料地选择了大众传媒节目。1997年,他主持电台节目《孤山夜话》,2000年又主持钱江电视台《谈话》,均取得成功。他还第一次把先锋戏剧、孟京辉的《两只狗的生活意见》引入杭州。

拍摄《喜马拉雅天梯》,萧寒不希望把创作停留在学术探讨的范围内,而是把触角伸向社会、伸向市场,引发更广泛层面人们的关注。之前在宣传领域取得不错成绩的《大圣归来》团队主动提出合作,联合了几百位众筹出品人,这些人的名字出现在了影片最后的字幕上。萧寒的努力取得了效果。尽管限于纪录片属性,院线排片并不佳,但是有的观众专门请假去看,有的观众穿越大半个城市寻找放映影院,还有的观众连看了六遍。这些都让萧寒感到无比的幸福与感动。

地球顶端的风,巨大而又平静。最洁白的雪其实是蓝色的,银河寻转,透明的冰川映出白天和黑夜。一只鹰飞过头顶,姿态像一种信仰和另一种信仰在打招呼。还有像萧寒一样的人,正在用生命捍卫梦想,那些不容失去却越来越少的梦想……

下一步,他将延续西藏、喜马拉雅、登山主题的创作,希望能打造出第一部登上院线的3D纪录片。



◆本报记者王琳琳

雪山晶莹巍峨,明亮的阳光洒向峰面,高空俯视下,一道由雪筑成的阶梯直直地伸向天空,一队身穿黄红色防寒服的人缓慢而又匀速地在绝壁上移动。画面清晰而绝美。一转,镜头切向近景,四下静寂的影院里,只有荧幕上传来的冰爪踩在雪上的破碎声、前进过程中的呼吸声。这里是地球上最高的一片旷野——珠穆朗玛峰。

105分钟,影片放映结束,观众久久不能回神。渐渐地,音乐声缓缓响起,灯光重新照亮了放映厅,观众席中响起了不约而同的掌声,响亮、有力,为这第一部攀登珠峰的人文自然类纪录片《喜马拉雅天梯》。

实现这一切的人叫萧寒,纪录片导演、画家、主持人、戏剧制作人以及大学老师。

源与行:一僧一寺的感动

因为萧寒,我们看到了海拔8848米的珠穆朗玛峰如此壮美震撼的风景。

拍《喜马拉雅天梯》,是萧寒一拍大腿的决定。2010年,萧寒开始接触纪录片。2011年,刚拍完《丽江拉夫斯基》的萧寒认识了雷建军,一位清华大学从事纪录片研究与教学的老师。他和萧寒年龄相仿,人生经历、学养背景也有很多共同话题。雷建军给萧寒讲了一个故事:

2009年,雷建军给央视拍片子时途经拉萨一所登山学校。在学校里,他认识了一个年轻的藏族学生。得知雷建军要去珠峰大本营拍摄,少年问他,可不可以把从拉萨买的十几本经书带给他父亲?

雷建军答应了。海拔5300米处的珠峰大本营有一个寺庙,叫绒布寺。绒布寺再往上,还有一个上绒布寺,建于1899年,距顶峰约20公里,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寺庙,寺庙里只有一个喇嘛,名叫阿古桑杰,是那个藏族少年的父亲,经书就是送给他的。老雷说,寺庙里没有电,当他把经书交到阿古桑杰手上时,年迈的老人咧开了缺了两颗门牙的嘴,抚摸着经书笑了。

这个画面打动了雷建军,更打动了萧寒。在西藏,天梯是接引世人灵魂通往圣地的梯子。西藏本土原宗教佛教的传说中,天有13层,由一条天梯连接天上和人间。当地藏民相信山体即是“天梯”,常见河谷或岩壁上白色颜料画成的天梯形状。

你能想象,全世界最高的一个寺庙里,只有唯一一个僧人在守候,而且他并不赞成攀登珠峰,认为这是对圣山的一种打扰。然而,他的儿子却一心想要成为高山向导吗?

“这种时空的交错和命运的安排瞬间打动了,生命、选择、信仰、现实、理想、纠结、时空、命运,所有的一切都在瞬间迸发。我说,我一定要把它拍下来。”于是萧寒锁定了这个一僧一寺、一座山、一群人的故事。

人与山:多元的原生真实

早在十几年前,萧寒就来过西藏。这个世界最高自然环境里的服饰、绘画、庙宇、雕塑、文化、理念和信仰,无不吸引着萧寒。不过,如何具体展现一僧一寺、

让孩子重新回到自然

◆王婷婷

在王愉看来,一个社会对于自然观的改变,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体现出来。这是一条很长的路。自然中感受到的智慧则给予她力量。

创建云南在地自然教育中心后,她希望通过户外体验,将孩子拉回自然中,重新建立孩子与自然的关系。

关注生物多样性,支持当地环境的本地保护

在云南大学读书时,王愉偶然听到了自然之友创始人梁从诫先生的演讲,就像一记当头棒喝,敲醒了内心。关爱自然、保护环境,需要每个人都承担一份责任。讲座结束后,王愉和朋友创办了“唤青社”,这也是云南最早的高校环保社团。

最初的环保实践过于简单形式化,效果并不好。她意识到,重要的也许不是自己付出多少精力去捡垃圾,而是如何让别人不扔垃圾。环境教育的种子自此在她心里种下。

毕业后,王愉开始在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与传统知识研究会工作。那几年,她经常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来回奔波。她接手的第一个

重要项目,就是云南省红河州哈尼族社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。

哈尼族以其独特的梯田稻作而闻名。他们世代生活在高山上,开垦梯田种植水稻,并且发展出了一套十分完备的民间森林保护和水资源管理方式,使得在大山深处种植水稻成为可能。

头顶是森林,山腰是寨子,山下是梯田。为了保持水土,哈尼族百姓把农田与其周围的生态环境融为一体,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生态系统。王愉和她的团队要做的,是以生物多样性的原则,支持当地环境的本地保护。

对于当地居民来说,生物多样性这个外来词汇显得十分陌生,尽管他们的耕作方式处处体现着这一点——一个几百人的村子里种植的水稻多达几十种。

最开始的沟通很困难。经过一年的相互了解,项目开始在当地村落中实施。其中有一项,是以乡村集市的方式开展“换种会”。通过换种的形式,让村民了解被外来种子冲击大潮下所种植的杂交水稻品种的多样性,并且思考如何有利于长期发展。

对王愉来说,项目至少在回溯乡村根源上起到了一些作用。这些举措,终究会对未来的乡村发展有所帮助。“如果没有这些外力促使当地居民重新思考过去实践的价值,没有人帮助他们寻找传统当中有意义的地方,

那冲击之后,传统难存。”王愉说。

倡导浸入式体验,重新建立孩子与自然的关系

在乡村工作时,王愉发现这里在环境教育上严重缺失。美丽的村庄旁边,围绕着从雪山而来的河流。本来清澈的河水,在流经农田的地方,漂满了垃圾。乡村自身缺乏处理垃圾的能力,也没有认识到环境污染的威胁。环境教育的需求很大,关注的人却很少。

2005年,王愉获得了去美国威斯康星州留学的机会。她选择将环境教育作为主修专业。威斯康星州对环境教育十分重视,对此有立法保障。大学里也设有环境教育专业,还有针对师范学生、在职教师的相关课程。课程大纲还规定了孩子在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环境教育目标。

通过学习,王愉得以了解美国完整的环境教育体系,在环境中心由老师带领,参与浸入式教学方式,体验真正的自然。

学成归来后,王愉又进入一家环境保护协会工作,担任项目部培训主管,通过采取在保护区周边进行社会营销的方式,推动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周边社区的行为改变。在这



一过程中,王愉学到了大量培训技巧和社会营销方法,为她之后创立“云南在地自然教育”积累了经验。

2012年,王愉和几个朋友成立昆明自然教育互助小组,探讨自然教育相关的理论方法和实际案例。他们之前践行环境教育时,主要以环境问题出发,实施的过程中总是遇到很多瓶颈,如课程乏味沉闷、案例流于表面等。

“在自然教育方面,现在的孩子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。一方面是缺乏好的自然环境去玩耍;另一方面是没有时间,他们的学习课程排得很满。像这样长大的孩子,连一只燕子都没好好看过,他能去爱护国家一级保护鸟

类,或者是关注几千米以外的一个保护区吗?”王愉试图换一个视角,从自然教育出发,把孩子拉回到自然中,重新建立孩子和自然的关系。

云南在地自然教育中心跳出学校教育模式,以社会运作的方式开展活动,给孩子更多的机会感受自然,使之逐渐产生保护自然环境的意识。

王愉在不断探索、不断深入。活动大多以户外体验为主。随着自然教育理念不断深入,王愉对这条路越来越有信心。原先曾有人质疑,这种强调体验和趣味性的方式是不是过于风花雪月,但从孩子们身上却可以看到实实在在的改变。

2014年寒假,王愉和团队带领孩子到云南南黎贡山开展冬令营,观察白眉长臂猿,认识森林生态系统。这个过程中,王愉并没有刻意讲解如何保护野生动物

但当孩子们经过跋山涉水,看到长臂猿的一刹那,一下子被动物本身的灵性所打动。之后的活动中,孩子们都在谈论白眉长臂猿生存状况的话题,并开始关注它们生活的环境。

“在这样充分的体验下,孩子的心里便自然而然地播下了一颗种子。”王愉说。为了更好地促进机构发展,2015年,在地自然教育加入了劲草同行项目。在资金、导师和诸多伙伴的陪伴支持下,团队不断壮大,全职人员从4人增加到了7人,石城自然学校成立,越来越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一过程中。“云南在地”希望搭建可持续生活的平台,将这份改变传递下去。